

一、八国联军进北京：中华民族 在屈辱中进入 20 世纪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 半殖民地的深渊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从 17 世纪开始，西方日渐强大，中国则日趋衰落。

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趋尖锐。资产阶级除了对内加紧压榨本国工人外，开始对外疯狂侵略和扩张。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中国，由于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然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掠夺的对象。

1793 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向清政府呈递国书，请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除广州外可以在天

津、宁波、舟山等地通商，在北京建立使馆，在舟山附近取得一小岛作为停歇、收存货物之用等等。当时的清政府仍然坚持传统的藩属观念，把马戛尔尼当作“英吉利贡使”接待了他，对他“优厚礼待”，但对英国政府的要求，一项也没有答应。马戛尔尼回国行前，乾隆给英国国王两道“敕谕”，对英使的问题答复如下：

关于派使者驻北京，“断不可行”。理由是与天朝体制不合。“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

关于通商，实无必要，因为“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至于在天津、宁波、舟山等处通商事，因“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兹多未便”，所以“皆不可行”。

关于要取得一小岛作为停歇、收存货物之用一事，“尤不便准行”，因为“天朝尺土俱为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

这样一来，马戛尔尼出使的目的，除了递交了一份国书外，其余什么都没达到。乾隆皇帝的回信实际上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宣言，它既体现了清政府维护主权的坚定立场，又表现了清政府“惟我独尊”的自大心理。而清政府所奉行的这种“关门”主义，恰好与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谋求打开中国门户，要求“自由”通商是针锋相对的。清政府的“关门”政策显然不符合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所以，当西方殖民主义者试图突破这一限制，强迫与清政府建立所谓“平等”的商业性的伙伴关系时，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首先以商品来轰击中国的大门。但在中国却遇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最顽强的抵抗。从 1786 年起，他们开始推销棉纺织品，因价钱贵于中国的土布，无法竞争，造成多次亏本。相反，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药材等，却在英国畅销。鸦片战争前近 70 年里，按中英之间正当商品的进出口贸易计算，除少数几年外，中国对英国的正常贸易每年还保持出超二三百两白银的优势。

英国资产阶级用工业品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没有成功，于是便采取更卑劣的手段——向中国倾销鸦片。从 19 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其中一部分属于美国、葡萄牙）急剧上升。1800 年为 4570 箱，1838 年达 40200 箱，增加了将近 8 倍。中国从贸易出超国变为入超国，每年外流白银约 500 万两。鸦片贸易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是一本万利，但对于被毒害的中国，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大量白银外流，造成百业萧条、国库空虚，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经济更加衰败；鸦片贩子大量行贿，使清王朝的吏治更趋溃烂；更严重的是吸鸦片烟者，到 1838 年已超过 200 万，不仅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甚至驻防旗兵、绿营兵丁也都手握烟枪，吞云吐雾。

对于鸦片泛滥，中国广大人民是切齿痛恨的。清政府亦曾三令五申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但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的走私与行贿，这种禁止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到鸦片战争前夕，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严禁与弛禁两种主张。道光帝于两者之间，举棋不定。1838年6月，黄爵滋（鸿胪寺卿）上疏道光，第一次提出以死刑重治吸食的主张。这一奏折被传谕各省督抚议奏。在复奏的28份奏章中，琦善（大学士、直隶总督）、伊里布（云贵总督）等20人反对，只有林则徐等8人赞成。

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年间进士。他痛感鸦片流毒中华造成民穷、兵弱、银涸的恶果，在其湖广总督任内严禁吸食鸦片，成效显著。1838年7月至9月，他三次复奏道光，极力赞同黄爵滋的主张，并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兵和饷是清朝统治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使道光下决心采纳严禁鸦片的主张。12月下旬林则徐奉旨抵京，8天中被道光连续召见8次，并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责令外国烟贩缴出鸦片，并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在广东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下，终于迫使义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和英美烟贩缴出鸦片237万多斤。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维护民

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1839年8月，中国禁烟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成立一个“伦敦九人委员会”，并组成了包括刚从中国逃回的大鸦片贩子查顿在内的三人核心小组，密谋发动侵华战争。9月下旬，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正式报告，首相巴麦尊当即表示对中国惟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接着，伦敦、利物浦、里兹等大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大叫大嚷，主张立即发动对华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2月，英国任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乔治·懿律为侵略军总司令和谈判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为副代表。4月，议会在经过辩论后，以9票多数通过了支付军费案，支持政府进行可耻的对华战争。6月，由16艘军舰、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以及4000多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结果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在南京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主要内容有：（1）中国开放“沿海之广州、福州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2）中国“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3）中国向英国赔款“银数共贰千壹百万元”；（4）协定关税，凡英国商品“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5）在赔款未付清之前，“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

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1843 年 7 月和 10 月，中英两国又先后在香港和虎门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规定：（1）“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2）中国“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这便是后来“租界”的起源；（3）中国将来“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之后，美、法、俄等国也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除割地、赔款外的所有特权。

《南京条约》及其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五口通商，中国被动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割让香港，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协定关税，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又使中国受制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所宣称的那种“平等”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一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一个“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封建士大夫成为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他们大胆揭露社会矛盾，提出改革方案，研究边疆史地，了解世界大势，筹划抵御外侮，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林则徐提出了“开眼看世界”的主张，魏源则呼吁统治者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当时的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整个社会没有丝毫改革的迹象。

与此同时，西方殖民势力却不满足于它在鸦片战争后所掠取的权益。最初他们企图通过“修约”的形式迫使中国全境开放通商，并允许它们在北京设立使馆，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他们决定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

1857 年英法两国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组成联军远征中国。12 月，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结果被俘。随后侵略者继续北上，1858 年 5 月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6 月 26 日和 27 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

- (1) 英、法两国公使驻京，与清政府往来用平等礼节；
- (2) 中国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

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可以赴内地游历、通商、传教；（4）修改税则；（5）对英国赔款 400 万两，对法国赔款 200 万两。之后，侵略者退出天津，并定于次年再来北京换约。咸丰皇帝对公使驻京及内地游历等款极为不满，打算用全免关税和弛禁鸦片来换取那些条款。这种争其所不当争，放弃其所不当放弃的做法，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者对外部世界及外交事务的无知与愚昧。

1859 年 6 月，英法两国带兵到天津，准备赴京换约。他们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在北塘登陆进京，而是蛮横地要从大沽口入京，遭拒绝后，竟以军舰攻击大沽炮台。大沽守军奋起抵抗，击退了侵略者的进攻。1860 年春，英法两国组织一支更加庞大的侵略军到达中国，4 月占领舟山，5 月侵犯大连，6 月占领烟台，8 月攻占大沽、天津，直逼北京，9 月联军进犯通州，八里桥失守，清军退至京师城下，咸丰帝逃往热河，命令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向侵略者求和。10 月 6 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0 月 24、25 日，奕訢被迫与英法代表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还规定：（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华工出国；（3）割九龙司给英国；（4）交还法国在华天主教教产；（5）赔偿英、法军费各 800 万两，恤金英国 50 万两，法国 20 万两。

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美、俄两国也以“调停”为名，行侵华之实。特别是俄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

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外，还从中国夺去了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经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仍然顽固不化，极端的守旧和排外。另一部分人则惊于列强的“船坚炮利”，主张对列强妥协，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进行“自强”，这部分人就是通称的“洋务派”，其代表人物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自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开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洋务运动的 30 年中，清政府先后开办了 19 个军工厂。其中以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最为重要。江南制造总局 1865 年成立，到 1867 年，就已建成了十几个分厂，此外还有洋匠住楼、工匠住房、翻译馆和方言馆，成为清政府开办的十几个军火工厂中规模最大、经费比较充足的一个，是清军武器装备的重要供给基地。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在经营军用工业的同时，陆续建立了轮船、煤矿、冶铁、纺织、铁路、电报等多类民用企业。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这些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军工业燃料、材料和交通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所谓“求富”。

由于洋务运动的创办者是封建官僚，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张之洞在后来写的《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反映了他们当初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洋务派是封建官僚，他们引进西方技术，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巩固封建体制。洋务运动是在封建体制的框框里进行的。本来，这类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应具有资本主义特点，但是只要洋务派插手，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几乎都成了封建衙门式企业，很少资本主义色彩。这就是洋务企业的封建性。又由于洋务运动是外国侵略者侵华政策变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事事处处依赖洋人、具有半殖民地买办性特征。尽管有的兴办者不无摆脱外国控制的主观愿望，但封建官僚的腐朽本质，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对洋人的依赖。洋务派办的军工厂，不仅机械设备、原材料从外国运来，工程师、工匠从外国请来，甚至连执掌企业大权的正副监督也从外国“引进”。他们把办好洋务企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洋人身上。而外国侵略者是不会要中国自强的，洋务运动的致命弱点就在于此，这注定了洋务运动不会成功。

当清政府决定与列强合作，“自强求富”时，列强为了保证在中国攫取的各种权益得以实现，也改变了对华的政策，即由“打”变成了“拉”。极力扶持清政府，以便通过它来控制中国，因此，在自强运动的最初 10 年间，中外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安时期，中国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但是洋务派所希冀的这种和平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延续多久。从 70 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国家又纷纷觊觎我国领土，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发生危机。在西边，俄国利用我国新疆发生叛乱于 1871 年出兵占领伊

犁，英国乘机侵略我国新疆和西藏；在东边，日本于 1874 年出兵进犯台湾，1875 年进攻朝鲜，迫使朝鲜订立《江华条约》，直接威胁中国东北的安全，为后来的中日之战埋下了隐患；美国则在一边极力怂恿日本；在南边，法国于 1874 年强迫越南签订《西贡条约》，把越南变为法国的保护国，之后法国就沿红河侵入中国的云南，终于演成 1884—1885 年的中法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日渐强大，于是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9 世纪八九十年代，英俄争霸中国东北及美、德、法各国的姑息怂恿，为日本侵略朝鲜和进攻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狂妄地挑起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于 1895 年 4 月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朝鲜完全“自主”，实际上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并禁止中国协助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2）割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 2 亿两；（4）允许日本资本家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商船驶往上述各地。这一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当时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康有为，联合各省前来应试的举人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迁都、废约、再战。台湾人民在得知台湾被割让以后，也纷纷上书请愿，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辽东半岛的人民则组织义军，准备继续抗日。清

朝中央及地方官吏中有人上书主张废约再战，有人甚至主张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光绪帝鉴于割地太多和全国人民的抗议，也曾一度拒绝批准，还派总理衙门大臣拜见俄、德、法等国公使。请他们帮助商改条约，但没有成功，最后光绪帝只好批准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大面积割地，破坏了中国领土的主权和完整。巨额的赔款，远远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利权作抵押大借外债，从而进一步受制于人。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在中国部分丧失了主权的的情况下，这只会加重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甲午之战及其结果，加剧了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形成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 1898 年至 1899 年间，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山东为势力范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以云南、两广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不甘落后，把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美国由于当时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顾及中国，待美西战争结束后，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保护美国在华利益。这样，到 1899 年，中国的主要地区都被帝国主义瓜分了，中国的海岸线上已经找不到可以作为自己海军基地的港口，中国的主要铁路干线也都落到了外国人的手里，中国成了一个支离破碎、任人宰割的国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亡。救亡，成了时代的

最强音。

改良派的变法维新

1898 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挽救民族危亡所作的一次伟大尝试。

维新变法思想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但蔚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则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之战给中国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反思：中国为什么会衰败到这种地步？经历了 30 多年的自强新政之后，一部分人终于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制枪造炮的技术还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衰败的真正原因不在技术，而在制度。因此，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从此，维新变法的思想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

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民族的危亡和社会生活的动荡，使他对清政府腐败逐渐不满。又由于在香港、上海等地接触了西方事物，阅读了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刊，感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优越，产生了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1873—1929 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1890 年起，进入万木草堂，从学于康有为，并协助进行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工作。1896 年与汪康年一起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维

新,1897 年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向学生灌输民权观念,并以充沛的爱国热情和犀利文笔,写下了大量的宣传西学、鼓吹变法的文章,成为康有为得力助手。谭嗣同(1865—1898 年),湖南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深受刺激,曾与同乡好友唐才常等在家乡筹办革新事业,并发愤钻研中西学问。写成《仁学》一书,怒斥三纲五常,号召人们冲决封建伦理之网罗,同封建专制制度决裂,是最激进的维新志士。他们三人中,康有为是变法运动的灵魂人物,1888 年在北京应试时,他就不顾朝廷禁止非官员的士子直接上书的规定,向皇帝呈递了一份轰动一时的条陈,请求“变成法”。后来他又上书多次,系统地表达了他关于维新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注意改革的文化依据。自 1890 年至 1898 年,他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来为改革建立文化上的基础,其中最有名的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变法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思考。变法的目标是国家的富强,要富强必须将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立宪政治,提高政府的效能,对外可以应付与西方列强接触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对内可以加快各项事业的发展。立宪政治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立宪政治也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才能完成,因此,迫切的任务是将组织老朽、功能退化的行政机构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他主张在中央设立“制度局”,通过这个新的政府机关,避开现行政府衙门的干涉,推行革新

计划。制度局由 12 个部门组成，即：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这 12 个部门，较之传统的六部，明显具有近代社会的特征。此外，在地方设立“民政局”，以为地方自治的初步办法。要大幅度地改革行政机构，势必需要大量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因此，康有为提出要改革考试制度和官员的升迁制度，考试的内容要能反映出入试者对儒家经典的学识和国内外时事的知识，任命官员不能只论年资或凭抽签而定，应该“举天下有能之士，不次拔擢”。为了确保革新人才的来源，康有为认为应发展西式学校。他说：西方之强大，源于其现代化的教育。“近者日本战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中国应模仿西方和日本，全国各村、镇都应设立小学与初中，高中以上的学校应设于县城、省城等任何条件容许的地方。他还建议设立译书局，以解决新式学校所需教材问题，选送优秀学生前往日本、德国深造，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如果能切实培养出一批批训练有素的人才，行政机构的改革就不会流为空谈和形式。

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变法奏章很感兴趣，他命令总理衙门把康的论维新的著作都呈送上来。《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以及康有为的其他著作，使光绪帝对变法增添了信心。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6 月 16 日，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授康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可专折奏事。7 月 3 日，光绪帝破例召见梁启超，赐以六品衔，令他专办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

9月初，召见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赐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在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余天里，光绪帝发出新政诏书110多道，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撤去闲散重叠机构；澄清吏治，提倡廉正作风；提倡广开言路，严禁官吏借故阻止官民上书事等等。

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开垦荒地，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广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等等。

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自由创办报刊、组织学会等等。

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编练海、陆军，裁汰旧军等等。

维新派想利用皇帝的权威，通过合法的手段，和平地、逐步地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维新派与光绪帝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上，有很大的差异。维新派的根本目标是君主立宪、是发展资本主义、是提高士绅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这些都是光绪帝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实现的。

新政虽然与维新派的真正目标相去甚远，但皇帝诏书接连不断地发出，使京城内外，呈现一派改革的势头，那些处在被改革线上的人物和集团开始惊慌起来。废八股，将堵截成千上万盼望“金榜题名”的旧式知识分子

的前程之路；裁撤闲散机构、裁汰冗员使大批官员有丧失特权的危险；旗人要自谋生计，更是惶惶然不可终日。这些人把希望寄托在慈禧身上，企盼她能尽快阻止新政的施行。光绪帝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大权实际操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她所控制的力量，足以扼杀有违她意愿的任何举动。慈禧是个很有经验的统治者，甲午战争后，她也感到，若再不变法，将危及到自己的统治。所以，当康有为开始推动变法运动时，她故意先放松一步，静观察变。当她发现康有为所推行的变法与她所希冀的变法相去甚远时，便毫不犹豫地充当起镇压维新运动的刽子手，成为顽固势力的代表。当光绪帝在 9 月上旬下诏罢免一些顽固大臣的官职，同时重用几名维新志士时，慈禧加紧了军事力量的部署。9 月 21 日，慈禧突然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宣布自己重新“训政”。随即捕杀了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康、梁变法失败了。从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到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后历时 103 天。维新派企图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了。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维新变法的目标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所代表的君主制度与传统的君主制度显然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加进了近代化的内容，变法以君主立宪为取向，必然引起人们对普遍王权和现存政治秩序的怀疑，它表明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从此，中国便沿着“变”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戊戌维新也